

一次高层次、高智力、高道德理念的科学审度和关注

——“21 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叙评

Review on “The Symposium on China’s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蔡德诚

(本刊副主编)

人类几千年文明的演进历程是一部伟大的发展史诗,“发展是硬道理”,其言凿凿。但是发展要与环境协调,人类要用高度的智慧与预见来控制、驾驭发展,使之能与环境之间趋于和谐,趋于双方互益反馈,趋于双向良性永续,这一日益获得全球共识的观念转变,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一世界性的人对自然新关系、新认识、新行动出现转折的大背景中,1994 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桩引人注目的大事。一是国家科委汇集近百位专家学者,历经一年半周密、严谨准备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正式出台;一是由李政道、周光召两教授亲自倡导、发起、主持的,也有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的“21 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究会隆重召开。前者是中国政府对 1992 年世界环发首脑会议决议极其认真、主动的响应,也是中国对人类共同前途这一国际义务的庄严承诺。后者则是中国高层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从自然规律的角度,从国情的角度,对“21 世纪中国的

环境与发展”作了一次高层次、高水平、高智力、高道德理念的科学审视和关注,对 21 世纪中国环境与发展中诸多重要的、实质性的难点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这里,我既作为一个编者,又作为一个学者,想从症结、焦点、特点、难点这一特定的角度;对这次会议发表一点观感和叙评。

对“基础、现状、趋势”作了根本性的把握

会中首先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全面发展的起飞阶段,但这种快速爬升起飞所依托的环境基础、环境现状如何,中国未来环境变化的趋势如何,这实际上是科学家们研究中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基本依据。这方面,中科院山地灾害所陈国阶教授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连续性的、趋向性的评估,即从解放前的背景状况、40 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目前仍沿用的决策偏好,作了动态过程的描述(见下表):

陈教授给出的上述情真字凿、不容置疑的动态

解放前的背景状况	40 多年的发展过程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仍沿用的决策偏好
人口数量巨大。	人口数量超载增长;人口质量提高滞后。	近 12 亿;数量压力、老龄化压力;低素质困扰;教育赤字。	重控制人口总量,轻人口素质提高;忽视老龄化隐患。
基本资源相对贫乏。	资源开发强度大;综合利用水平低。	土地资源不足,超载负荷;水资源危机加剧;多种矿产资源告急,面临赤字。	对各种资源重开采,轻管理;重消耗,轻节约;重原料开发,轻综合利用;采富矿,丢贫矿;挖心矿,弃边矿;重总量开发,轻利用水平和效益。
社会、经济严重落后。	经济增长率高;经济、技术水平低,效益低。	以高资源代价获取高速增长,单位产值消耗居高不下;产业效益低,亏损严重;财政赤字趋增。	极高的增长欲望,重速度,轻效益;重扩建,轻内涵;重产值,轻销售;重投入,轻产出;重本位利益,轻基础、公益事业;重长官意志,轻科学决策。
自然环境相对脆弱。	环境总体恶化严重;治理严重滞后。	污染累积量递增、范围面积扩大;自然生态破坏严重;环境赤字、生态赤字加剧。	重舆论形象,轻实质进展;重规划,轻实施;环境意识普遍薄弱;决策被动、立法脆弱;治理投资空位,环境监督虚位。

描述,不仅从总体上、从过程上客观把握了我国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这一国内各界公认的环境现状背后的强劲历史动因,更使人惊心地看着今后仍有继续导向恶化的历史惯性!这一幅来龙去脉的态势演化图,实际上是一幅清晰的、尖锐的、激人猛省的现代“警世图”。这幅图使任何一个清醒的、理智的、有责任感的人,只能从中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必须改变人们惯用的思想、惯用的观念和惯用的行为模式,特别是要改变目前仍在沿袭的决策偏好,否则未来的河山,未来的国土,未来的一切地上地下、水上水下的资源,未来十几亿人民的生存空间,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整个问题的总症结、“总开关”在于人的素质,特别是各级干部的素质

与会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深入讨论 21 世纪中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症结时,也不约而同地得出另一个清晰的结论——最关键的是人的悟性、人的素质,既包括所有社会成员,更重要的是领导层、参谋层、决策层成员。后者是全民悟性、素质能否尽快向正确方向提高的总关键、“总开关”。严重的任务在于干部的教育,在于公众的教育,在于下一代的教育。从现在起,要付出数十年、上百年的不懈的努力于教育。环境教育应成为未来一百年中的核心教育之一。几十年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切环境的污染、一切生态的破坏,首先发端于各层各级的决策思想、决策方向,发端于各级各层干部们的行事准则。没有这个以干部为重点、为对象的,以改变思想、改变观念、改变行为方式为目的的“一百年不变”的教育,没有科学思想、科学规律对干部、官员贯彻始终的理性约束,科学家们再多的忧心,再多的努力,再好的“蓝图”,再多的工程技术系统体系,终将付诸东流,望“愚”兴叹!

环境道德观——不可或缺的现代基本道德约束

一般概念中,对干部、对公众的环境观教育,主要是着眼于、立足于、侧重于环境与发展对人类自身利害、祸福、存亡等功利尺度的教育和引导,以启迪环境悟性,提高理智素质。而这次研讨会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原中科院副院长孙鸿烈教授引用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程序首创的新观念,郑重地提出了“环境道德观”的问题(详见我刊本期程序《倡导“生态道德观”是科技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一文)。孙教授强调的这个问题、这个观念,其寓含的崇高精神和道德力量十分尖锐,十分逼人。趋利避祸当然是人类的睿智选择,而更高于利祸之上、睿智之

上的是人类的道义选择、道德选择。对任何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素养的人来说,当某种名利、机遇与其心中的精神旗帜——基本为人的道义准则、道德操守相冲突、相抵触时,总是会义无反顾、心如明镜似地选择后者,这正是人类作为高级生灵所特有的道德灵性、道义力量之所在。孙教授真挚地指出:“环境道德观”应在我们当代中国人中树立起来,尤其要在各级决策者、领导者中建立起来。的确,任何一时一事的功利、功业,即使是当代、当前最大的功利、功业,如若危及、危害子孙后代的生存、生态利益,那么具有起码环境道德观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舍弃那些如同不义之财一样的“不义功利”、“不义功业”,就如同任何一个有道德理念、亲情情感的父母绝不会为一己的、眼前的利益而忍心让子女蒙受任何潜在的灾祸一样。一些大工程、特大工程,理所当然应以对后代、对长远的生态利弊为根本取舍。这实际上是人类是否具备现代最高智慧和现代最高道德准则的一种试金石。或许可以说,每一个当代人,或早或晚都将面临这种道德、道义的考验和选择。在这种考验和选择面前人人都要悟之再悟,慎之又慎。否则,科学规律和道义、道德的历史回报都将是一丝不苟、因果必应的。

要直面研究、决断中国独有的、特有的命题和难题

这一命题是中科院地理所陆大道等研究员郑重提出的。陆大道指出,根据当前已显现的中国后发性、补课性工业化势不可挡的势头,中国在 21 世纪资源、环境、人口与发展几大要素中,必将面临一系列中国特有的、独有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都必须尽早透彻研究,尽早作出决断。如:

1. 由于现行的户口政策、城市劳动市场政策,全国大中城市城乡结合部将不可避免地持续扩张化、长期化、永久化,并由此引起结合部人口、生态环境严重失控,持续恶化。

2. 城市交通—轿车工业方向模式的战略选择问题。根据人口基数、年增长量、人均能源资源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城市空地面积,中国似应尽早明智地弃拒“普及个人轿车、家庭轿车也是中国现代化象征”、“以国内为市场的轿车工业是中国工业化的支柱”这类完全搬用西方模式,却又似是而非的误导。要尽早选择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交通模式和轿车工业的发展方略,以免今后陷入长期的、总体上的战略被动。

3. 必须正视日益加剧的“西方现代化消费模式”对中国的严重误导,及早全面研究、全面引导适应中国国情、适应普遍民情、能均衡持久的中国现代消费模式。

人民大学欧阳志远也正式提出,要从我国环境、人口、资源基本国情出发,重新认识,重新确立我国未来公众的生活质量的基本参照标准和规范。应该摒弃将西方富翁奢侈生活标准视为我国未来广大公众幸福生活象征和目标模式的种种公开的和隐含的意识引导和影响。

4. 根据以上基本抉择,重新调整、制定以结合需求、面向世界、融入世界经济、内外互补为原则的新的资源进出口政策和新的技术贸易政策。

中科院政策所的王铮副研究员指出,中国当前在农业、环境与开发方面正出现一种两难局面,即一方面南方传统粮仓地区的沃土良田弃耕撂荒严重,出现变“南粮北调”为“北粮南调”的危险信号,而另一方面,生态环境脆弱,水源、土地贫瘠的西北地区、西南贵州地区,为求生存长年扩大耕地,破坏植被,出现“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格局。他提出,面对这一两难格局,一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是,将生态脆弱、经济贫困地区的人口适当地向东南沿海农业地区以“包农队”的形式,逐步移民,以维持东南沿海粮仓沃土地区农业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行,以确保国家“主粮仓”广大沃田的天然优势和生产潜力的发挥。为了解决可能随之而来的南方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应在东南发达地区实行更为开放的城市政策,以大量吸纳当地原农业人口。同时,以经济高回报率为导向、定期合同等方式将东南城市的各级技术人才引向西北地区,以扩散东部的技术与管理来推动西北各类乡镇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当地产业结构的改变,逐步实现西北地区环境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北京大学王恩涌教授也指出,为了规避北方变干、变冷的不可抗拒的全球气候大周期变化,中国历史上曾几度出现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的合理迁徙。他还指出,北京毗邻地区,小麦亩产200公斤需要灌溉500~600吨水,如果将水资源的代价计入成本,这种粮食生产是极不合理的。

要根本改变发展与环保“两股道”的传统模式,研究、设计、推动“一股道”、“全过程”的“洁净生产”

中国社科院余谋昌研究员在研讨中提出,要谋求人类现代谋生范式的根本改变,要逐步摒弃开发、投产资源中的90~96%变为废弃物,仅4~10%成为有用产品的现行生产范式。通过研究、发展“生态技术”,谋求基本无废弃物的新生产范式。

这一意见与孙鸿烈提出的要发展“洁净生产”的意见不谋而合。孙指出,迄今为止的中外文明发展过程中,“发展”与“环保”始终是各干各的“两股道”,提出应彻底改变这一观念模式,要孕环保于发展中,力求人类的任何活动都自觉做到以人工生态

系统来替代、来平衡自然生态系统。以往那种竭力达成一项目标,却留下一大片破坏的“先发展,再治理”之路不可再走。

华南农大骆世明副校长、农业部郭书田研究员都提出要将中国几千年发展中形成的农、农、农、林、林、渔、渔、农、渔、林、渔、农、牧、林、牧等有效、合理的传统生态系统技术加以现代化,使之与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结合、组装、接轨。这样做必将有特别的生命力和前景,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均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上述意见是针对“现代农业”中大量化肥农药污染、土壤退化、环境毒化这种“污染毒化式”生产而发的,目的也恰是在农业中推动现代“生态型”、“洁净型”生产,变环、发“两股道”为“一股道”,变“掠夺式”、“破坏式”生产为“增益式”、“良性式”生产。这正是这次会上各方面专家异口同声、所见略同的共同理念。显然,这一理智目标的实现,将取决于决策、设计、实施几大环节,但首要的,是要从根本观念、根本思路上有个根本的转折。

要集中人才、技术、资金的力量,建立示范、引导的范例区

鉴于认识上的差异和取得共识所必须的客观过程,同时苦于科学家们现有的有限力量、能量,会议研讨中,中国社科院朱传一研究员、北农大韩湘玲教授、国家环保局夏光、中科院环境生态中心李继云等专家都提出,目前科学家们能做的有实益、有实效的实事,就是力争在有代表性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渤海湾、西南、西北地区各选一个其主要领导干部有环境悟性、有科学素养,且在环境、人口、资源方面有地区代表性的五六个县级区域,集中全国环保科技界的人力、物力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财力相结合,组装、配套应用这次会上首次提出的,以可视、可测、可比、可操作为特征的十大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详见建议书),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在上述五六个县级范围区域切实建立起可在本地区范围内推广、普及的可持续发展的典型范例区,以可见、可测、可比、可操作的榜样作用,分头分片推动上述地区大面上的“可持续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

这次会中,与会的各方科学家思想开放,眼光深远,见识卓灼,言词恳切,触及甚深。各种建议、建言,亦十分中肯、求实。本文所叙所评,受限于个人一己之耳目、之感悟、之局促,偏颇处请读者从本期同时刊出的会议正式建议书中一一补正为盼。

最后,要特别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主席牛文元教授,他不仅出色地组织了这次会议,而且也给予我们《科技导报》以热情的帮助和支持。